

學生移動力？政治變革後充滿不確定性

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教育組

有報導稱，在 COVID-19 之後，國際學生的移動出現了樂觀的反彈。但我們不能忽視當前地緣政治的現實和不穩定性對高等教育流動性和國際化可能產生的影響，本週荷蘭極右翼反移民黨在選舉中獲勝就說明了這一點。

2023 年幾乎是美國國際學生人數創紀錄的一年--四十年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長率，幾乎回到了疫情前的水平。歐洲的留學生人數也在上升。

但是，在這些美好的數字背後，在美國國際教育領導層不出意料的積極表態背後，有一些現實問題值得深思，它們可能會對未來的國際學生人數以及教師流動性產生重大影響。

在歐洲，國際學生的流動性已成為關於（技術）移民的辯論的核心，各國之間和各國內部的觀點不一，荷蘭最近的選舉和丹麥關於國際學生的轉折性決定都說明了這一點。

全球不穩定

事實上，2023 年的世界極不穩定。

烏克蘭戰爭仍在繼續，看不到結束的跡象。截至 2023 年底，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的戰爭仍在繼續。即使武裝衝突很快結束，毫無疑問，中東政局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仍將動盪不安，這將對該地區和學術界產生不可預見的影響。

中國與歐洲以及美國、加拿大和澳洲之間的經濟和政治緊張局勢仍在繼續，儘管目前程度較輕。

印度和加拿大相互衝突，阿根廷總統大選和荷蘭議會選舉顯示，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仍在抬頭。在這些衝突中，國際學生和教師的流動也許不是主要問題，但肯定會產生重大影響。

關注美國的不穩定性

許多媒體討論的都是美國留學生人數的顯著增長--比上一年增長了 12%，而自疫情以來美國學生留學人數的微弱復甦卻沒有引起太多關注。美國國際領導人的所有評論都是完全正面的。

由 11 個教育組織組成的新聯盟在本月宣布了「成功的美國」(US for Success) 這一極具民族特色的名稱，倡導招收更多的國際學生並為經濟做出貢獻。

但是，潛在的現實問題非常嚴重，值得關注。毫無疑問，最大的潛在挑戰是川普有可能連任總統。事實上，美國一些受尊重的全國性和地區性民調顯示，如果現在舉行大選，川普將會獲勝。

當然，距離大選還有一年時間，很多情況都可能改變。但英國權威雜誌《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在 11 月 16 日出版的「2024 年的未來世界」(The World Ahead 2024) 特刊封面上刊登了川普。

眾多美國政治學者對此深感憂慮。國際教育界對可能出現的「川普效應」視而不見是不切實際的。川普本人已經明確表示，他的第二個任期將比第一個任期更加強硬，這無疑會對簽證、政府政策以及同樣重要的訊息傳遞產生影響。

2023 年國際教育協會 (IIE) 的數據顯示，學生的來源更加多元。來自中國的學生人數持續緩慢但穩定地下降，而來自印度的學生人數則增加了 35%。來自巴西、日本、奈及利亞、英國、尼泊爾和加拿大的學生人數也顯著增加。

但其中一些國家，特別是印度、尼泊爾、巴西和奈及利亞，相當依賴當地的經濟條件、當地貨幣的強弱、政治動盪和相關因素，很可能非常不穩定。雖然這些國家的中產階級不斷壯大，但他們仍然很脆弱。這一點尤其重要，因為 82% 的大學生自費學習，只有 10% 的學生接受資助。

美國社會的狀況也令人擔憂。萬曉峰 (Xiaofeng Wan) 的研究表明，潛在的中國學生及其家庭對美國的槍支暴力、反亞裔種族主義和其他安全問題深表擔憂。

中美關係的不可預測性也是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這些因素可能適用於其他國家。在過去的幾年中，我們已經注意到學生的流動性從亞洲內部和非洲轉向了中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度等國家。

最後，也許有一個數據很能說明問題，那就是當國際教育大會詢問管理者需要什麼來實現他們的國際招生目標時，只有 24% 的人說他們需要雇用更多的教師。我們不禁要問，如果越來越多的國際大學

生來了，誰來教他們呢？

歐洲的複雜性和現實

在歐洲，關於國際流動性的討論是激烈的，但也是多元且複雜的。

在移民議題的辯論中，學生和教職員的流動問題與關於尋求庇護者、非技術移民（大多來自歐盟內部）和技術移民（大多來自歐盟外部）的辯論混雜在一起。

在德國，政府和基民盟-基社盟反對黨都贊成吸引國際學生和教職員工，作為國家對技術移民需求的一部分。幾年前，丹麥決定停止招收國際學生。但最近，丹麥政府徹底轉向，現在希望吸引留學生，希望提高他們的居留率，從而填補技術勞動力的空缺。

在英國，保守黨政府內部一直在爭論招收留學生與移民的關係，以及停止招收留學生對大學經費的影響。與此相反，在法國，人們呼籲增加留學生人數並使其多樣化。

在荷蘭，留學生和教職員工成為 11 月 2 日議會選舉的關鍵議題，這也是右翼政黨呼籲停止或至少大幅減少所有移民的一部分。

主要理由之一是荷蘭人和當地學生的住宿短缺，其次是英語教學，他們認為英語教學吸引了過多的國際學生（40%的新生是國際學生），其中許多人來自歐盟國家，因此也有資格獲得助學金。這意味著荷蘭需要考慮成本因素。

極右翼政黨自由黨（其主要議程是「荷蘭優先」（Dutch First）和零移民（Zero Immigration）的勝利，以及包括新政黨新社會契約（New Social Contract）在內的可能的聯盟，將對高等教育部門產生嚴重影響，更不用說在經濟上對技術勞動力的需求了。

新社會契約（New Social Contract）的議程包括停止高等教育中的英語教學，並將包括留學生在內的移民人數從目前的每年 22 萬人減少到每年絕對不超過 5 萬人。

總之，歐洲人仍在努力尋找一種折衷方案，一方面需要增加技術移民，以實現經濟和社會的長期永續發展，另一方面又在短期內呼籲減少移民總量。

歐盟委員會於 2023 年 11 月 16 日宣布了一項關於技能和人才流動一籃子計畫的倡議，其中包括建立一個歐盟人才庫，為歐盟的雇

主和第三國的求職者牽線搭橋，以及採取措施促進資格認可和學習者的流動性。個別國家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運動則在另一側推波助瀾。結果是缺乏決策和方向。

不確定的前景

在研究國際化和流動性的模式時，忽略現實和趨勢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這些現實和趨勢可能不符合一個方便的說法。

有一點是明確的：COVID-19 對人員流動模式的影響並不像某些人預測的那麼嚴重，但仍有足夠的不確定性和負面趨勢需要仔細分析。事實上，即使是粗略地審視當前的全球政治現實和發展，也會發現高等教育流動性和更廣泛的國際化的前景很有問題。

撰稿人/譯稿人：林雅婷

資料來源：University World News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story=20231124145832346>

